

当代西方认知资本主义语境中 政治哲学的三重“议题”

孙亮

【内容摘要】 在当今西方社会发展进程中，以吸纳认知、神经为主要增殖方式的“认知资本主义”已日趋深入，导致西方政治哲学在根本上必须重新思考三重“议题”，即政治主体自由意志的丧失、政治共识的分裂与政治规范的解构。首先，政治主体被技术重构为可预测的神经行为单元，使得自由意志的选择能力逐渐丧失。其次，资本在感知层面与神经系统的深层嵌入，既干扰了人们对于共识的认知能力，还导致了共识空间的崩溃与公共领域的退化，使得人类社会性链接与公共性失去了存在的根基，进而瓦解了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政治共识。最后，微观治理术与政治的科学化发展将政治重组为一套系统性技术过程，以工具理性解构了政治规范。为此，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视角看，充分规避资本对技术创新的钳制，建构新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才能化解认知资本主义对政治哲学的冲击，并重新找到发展方向。

【关键词】 认知资本主义 政治哲学 危机 资本批判 新方向

【作者】 孙亮，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上海 20024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阈中的‘认知资本主义’研究”（23AZX002）

人类的政治生活进入了一个奇异与悖论并存的智能时代：一方面，“数字化秩序在今天接替了大地的秩序”，^①重新塑造了人类的社会关系，经济模式、政治生活、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另一方面，“世界变得难以把捉，变得缥缈，变得幽灵化了”。^②人们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的确定性逐渐被动摇，对“何以为真”的判断执念也开始松动，“既然机器已经有了如此高的计算速度，那么人类进行思考所需要的时间就显得毫无意义”。^③而且，随着认知与神经科学的迅速发展，人的行为能够被精确量化为数据，并被设计成为相应的科学化处理对象，这自然引发了资本的兴趣并促使其深度融合。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已表明，剥削从劳动力向心灵、神经系统

①② 韩炳哲：《非物》，谢晓川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3年，第3页，第4页。

③ 乔纳森·克拉里：《焦土故事：全球资本主义最后的旅程》，马小龍译，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3年，第79页。



① 弗朗科·“比弗”·贝拉尔迪：《灵魂在工作》，李小均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第2页。

② 孙亮：《当代西方认知资本主义剥削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1期

③ Maurizio Lazzarato, *Signs and Machines: Capitalism and the Production of Subjectivity*, Los Angeles: Semiotext(e), 2014, p.25.

④⑤⑥ 罗伯特·凯恩：《当代自由意志导论》，徐向东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第3页，第56页，第128页。

的拓展，有助于建构出更深入的资本增殖机制。在认知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则把心灵、语言和创造性当作价值生产的首要工具。在数字生产领域，剥削主要作用于人类劳动时间所生产的符号流上”。^①除了经济领域的变革，这种认知资本主义（cognitive capitalism）同时也是一种治理技艺，它在智能化发展中将会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化，逐渐成为西方社会治理的主导形式。^②按照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的观点，现代资本主义不再主要通过压迫身体来控制个体，而是通过非意指符号学（a-signifying semiotics）系统产生“机器奴役”效应，即个体在不经主体认同或意识参与的前提下，被直接嵌入某种社会技术系统中，从而成为其中的功能性齿轮或中介节点。这种奴役不是基于暴力胁迫或观念说服，而是通过感知、行为、情绪的实时调配与集成，实现对人的“功能性整合”。“在机器奴役中，个人不再是‘独立的主体’‘经济主体’（人力资本、自我的企业家）或‘公民’。相反，他被认为是一个齿轮。”^③由此，一个崭新的认知资本主义时代来临，商品交换体系的话语规训让位于一套借助算法、数据监控、神经吸纳的“去主体化”治理机制。它通过设计神经环境与感官反馈机制，使主体自动地、无意识地达成可预测、可计算的行为反应，这里的主体只是一个听指挥的“功能性存在”。身体、思想与感受本身被转化为可操控的数据源，成为算法计算与资本捕捉的直接对象，资本从而能够借此实现新的价值抽取与控制。

在上述背景下，作为政治哲学根基的政治主体的自由意志、政治共识、政治规范是如何被消解的，特别是主体是如何沦为可测量、可训练、可变现的神经单元，自然成为政治哲学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在一个由算法调控、情感驱动、神经征用构成的认知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哲学将以何种形式存在？对此进行尝试性研究，在汉语政治哲学研究中还是一个“新论题”。为此，本文的论述将作为一个引子，希望有助于人们认识到政治哲学与当代资本主义新进展是相互形塑的，只有破除认知资本主义给人类生存带来的危害，充分规避资本对技术创新的钳制，才能为重新激活政治哲学的新话语体系奠定坚实的现实基础。

算法支配下自由意志的丧失：政治主体的存在困境

一般来说，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史鲜明地支持个人的自由和自主性，将自由意志视为个人权利的基础。许多关于公民权利、政治参与和社会契约的讨论，都离不开对自由意志的假设。在他们看来，政治是民众之间通过对话协商达成一种具有“公共性”的普遍意志，从而构成符合共同理性的实践空间；自由意志则是政治行为者成为“共在者”、实现人的尊严与能动性的重要体现。因此，确保个体在政治生活中具备言说和行动的能力，主体公开其判断、愿望与立场，即自由意志的公开化，是构建公正社会的根本基础。但自由意志“是最困难的一类问题，从最近的哲学史看，它们‘也许是所有哲学问题中争论最多的问题’”。^④按照罗伯特·凯恩的看法，对待自由意志的主要观点分为三类：（1）自由意志与决定论兼容。兼容论（Compatibilism）认为，即使世界是受因果律决定的，人也可以拥有自由意志，只要行动是由“内在的原因”产生，如意愿、动机等。（2）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不兼容，否认自由意志。强决定论（Hard Determinism）认为世界完全是受因果律决定的，因此否认自由意志的真实性。（3）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不兼容，但自由意志真实存在。意志自由论（Libertarianism）主张要有真正的自由意志，且行动必须是不被决定的。当然，凯恩倾向于第三类。^⑤对于第二类观点，凯恩持批判态度并罗列了学界给出的理由。首先，强决定论会导致“道德责任的不可能性”，^⑥即如果强决定论是真的，那么没有人对其行为真正负责任，

因为如果每一个选择、行为都由过去的原因决定，而这些原因又不是你选择的，那么你对这些行为无法承担“终极责任”。其次，“罪与罚”等司法概念将变得空洞，因为“我们将不得不放弃惩罚的报应理论”。^①再次，强决定论还会致使个人关系产生缺陷。例如，人们会思考：“如果你相信一个人对你的爱是由遗传和环境决定的，那么这个人对你的爱的价值会缩水吗？”^②最后，缺乏责备、怨恨等会对社会产生可怕的影响，所以“自由意志的幻觉已经存在”。^③简言之，凯恩之所以反对强决定论，不是因为它在逻辑上不可能，而是因为它在道德上令人无法接受，在经验上与人类实践冲突，并且在哲学上也牺牲了人作为行动者与自我形成者的根本地位。他也为自己的意志自由论做了辩护，核心的理由是终极责任 (Ultimate Responsibility)，^④即一个人如果对某一行为负“终极责任”，他不仅必须是该行为的直接原因，而且要对产生该行为的内在动因，如性格、动机等也负有责任。例如，如果有一个施暴者在冲突中失控殴打他人，他会说控制不了自己，脾气就是这样。决定论者会说，他是因为童年经历、家庭暴力等原因导致其无法控制自己。但是，按照凯恩的看法，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他在成长过程中是否从未在愤怒与自制之间有过冲突？是否从未在关键时刻可以选择反思、克制、求助？如果他曾自由地选择忽略良知、放纵愤怒，那他现在应该对自己的暴力行为负有“终极责任”；如果他从未经历过那种选择时刻，那他不具备“完全的终极责任”。凯恩列举出这些自由意志类型及其支撑理由的论证，其着重点实际上在于，政治哲学不能缺少自由意志的奠基。正如康德所认为的那样，“自由的公设”是“产生自持存与道德法则的完整履践相适应这个实践上的必要条件”，^⑤而政治作为“众人之事”的一个前提是政治行为者有自由意志。在此前提之下，政治哲学要实现的是有自由意志的人通过集体行动使得“共在”更加正义、自由，更加有助于各自的美好生活。上述凯恩的讨论虽然在第二种类型上指出自由意志不存在的状况，但他给出的理由仅仅是将强决定论视为“形而上学的主张”，即认为在任何时刻，过去状态连同自然法则把未来完全决定下来，没有看到未来具有的多重可能性存在。这使得第一种与第二种类型虽然强调自由意志，却没有在根本上回应自由意志所遭受的现实的决定力量。

在政治哲学中，政治行为本身构成了“自由意志”的外化与实现路径。然而，当我们从“形而上学”的决定论转向对政治所依附的资本主义生产变迁的考察时，“自由意志”这一主体之所以作为主体的理由也遭到了重创。对此，可以一句话概括：“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⑥只不过，马克思当时更多考察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在那个时代，剩余价值榨取所采用的实质吸纳的方式还不具备很高的技术支撑。但是，随着资本主义新发展的推进，尤其进入资本主义对人的神经与认知剥削的阶段之后，自我意志成为被逐步吸收、编码的对象，最终发生根本的变形和功能瓦解。在认知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生产中，利用人类神经、情感、认知等内在体验，已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主导方向。由此，也形成了认知资本主义独有的各种问题。比如，“私营实体（主要是科技、信息和社交媒体领域的大型企业）系统性地剥夺我们的个人数据，并宣称拥有这些数据的所有权。当我们在互联网的数字世界里穿梭时，且随着面部识别和其他追踪技术的普及，我们的生活片段也日益被捕捉、分析和商品化”。^⑦换言之，资本致力于捕获关乎人的行为的注意力、情感和心理状态等，并进一步将其作为新的生产要素以加工“未来生活商品”，从而设计并控制了未来人的行为。今天，平台和算法精细设计内容以引导情感和偏好，这已成为普遍现象，个体的选择变得越来越依赖技术的引导，以至于自主的意志或选择在这里只是被伪造出来的，其实人只是像木偶一样被操纵着。除了人类行为受到潜在控制之外，信息的碎片化和短暂停留使人们没有思考的“时间”，限制个体对所接收内容进行深度反思以及接触多元观点，这无疑

①②③④ 罗伯特·凯恩：《当代自由意志导论》，第135页，第138页，第142页，第218页。

⑤ 李秋零主编：《康德全集》第5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0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4页。

⑦ Kenneth Lipartito,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Origins, History, Consequences," *Histories*, vol. 5, no. 1, 2025.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个人的价值观念和思想能力，进而削弱了自主判断的能力。比如，智能生活的深度操控还体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为了判断自己是否达到健康标准，在晚上睡觉时会用穿戴设备记录睡眠的各种状态，一旦早起时发现数据偏离，就很容易整日心神不安。可见，人会渐渐丧失真正的自主思考能力，当判断标准完全依赖算法数据，人就成为了算法的“奴隶”。甚至当我们以政治哲学倡导“言语表达”最应该反映自由意志时，在认知资本主义的发展态势下，事实却是算法平台操控了个体的言语，使其内心真实的思想与情感被压制进预设的功能性表达框架中，因而表达也是在预定话语轨道中生产的。每一次发帖仿佛都是在既定轨道上的一次次重复性动作，平台通过设定“情绪接口”、操控反馈节奏，不断调整、规范个体行为，从而使其更符合商业化传播逻辑。久而久之，表达本身失去了作为主体意志外化的意义，转而成为数据流程中的一环，个人也不再是具有创造力的主体，沦为算法经济中可被提取、消费的“内容原料”。最终，自由意志的外化成为了伪命题。

宽泛一点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每一次的网络点击行为，同时也在塑造一种使我们丧失反思性能力、组织化政治行动的力量，即“点击即异化”。点赞、观看、转发，这些本质上由资本逻辑深度塑造、主导的用户行为方式，早已被收编进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体系之中，也成为符合这一体系的政治要求，在获得了制度承认的反馈之后，又反过来以功绩化的方式推动了我们“伪表达”的泛滥。比如，平台通过流量分发与反馈机制将反映人们日常生活行为的数据赋予可计量的符号价值，使它们在制度内部获得承认与奖赏，从而构成一种新的绩效经济。在这种经济效益逻辑下，表达只是以“可传播性”“可点赞性”来组织自身成为经济数据，而不再以思想与情感的真诚流露为核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政治本身的消失，而是政治以更为隐蔽的政治形态转码实现其目标。由此，在政治层面上的表达发生了根本转向，主体不再能够通过言说与行动去建构公共世界的意义秩序。人是平台自身流动机制中的“参与者”，只能按照参与的逻辑实现被动的行为与思考，而不是展开体现自身主体性的意图。人仅仅是在既定平台神经网络中微弱却可用的“参与数据”罢了。当公共议题、身份话语、社会集体认知与行为都已经按照既定的算法进行排序、过滤与推荐时，资本主义构建出一种看似去意识形态化、实则高度控制化的数字空间，个体的自由意志便消失了。

所以，我们不需要像罗伯特·凯恩那样纠结于自由意志存在与否的形而上学式论证，而是要考虑自由意志被认知资本主义牵引的统治结构。正是这种结构决定了个体行为者不再经由反思性的主体生成来建构自身，而是严格按照一条预设好的、持续运行的参与-反馈循环框架来指引其生存，主体性因而逐渐退化为平台结构中的生物接口。资本对神经机制的渗透与重新编程，使其实现了对“神经时间”即感知节奏、情感调节与欲望驱动的深度控制。这一对“感知-神经”的捕获与重构是资本增殖的内在需求，它会进一步瓦解政治哲学所需要的“自由意志”，主体性不再以“我思故我在”确证自身的理性维度，也不再通过“我行动故我变”实践其历史能动性，而是陷入一种被动的、“被投喂的存在”的生命形式。

神经吸纳与虚假的“政治共识”：政治合法性的分裂

自柏拉图以来，西方政治哲学便关心什么使统治合法，而政治共识（political consensus）正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讨论了政治共识的起源，认为其源于对

死亡的恐惧和对和平的渴望。在“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自然状态下，理性的个人同意放弃一部分自然权利，将其转让给一个绝对的权威（利维坦），以换取安全和秩序。约翰·洛克则在《政府论》中认为，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consent of the governed）。人们天生拥有生命、自由和财产权等自然权利，他们达成共识，建立政府是为了更有效地保护这些权利。卢梭的公意论更为人所熟知，在他看来，“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①在现代多元社会中，罗尔斯的重叠共识具有代表性。他要解决的问题是：“一个因各种尽管互不相容却合乎理性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而产生深刻分化的自由平等公民之稳定而公正的社会如何可能长期存在？”^②进而“制定一种政治的正义观念”。^③对于哈贝马斯来说，真正的共识不是预先存在的，而是通过理性的公共商议和辩论达成的。他提出了“商议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理念，认为“利益之间的矛盾需要在彼此竞争的价值态度和利益立场之间进行合理平衡”。^④可见，政治共识不仅是一个研究对象，更是理解政治正当性、社会稳定和正义实现的基础框架，它贯穿于从古典到现代的各种政治思想体系中，成为政治哲学的中心议题之一。

一般来说，政治共识的基础主要是自我保存、天赋权利、共同体道德、理性公民等，侧重于从“主体”出发，构建一个规范性的、理想化的共识基础，这在哲学上被称为“规范主义”（normativism）的路径。而在“现实主义”（realism）路径看来，譬如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抛弃了中世纪的道德说教，直白地论述统治者应如何运用权术来维持统治，其一切行为的基础都是为了维护国家，也就是君主自身的权力与利益。当然，马克思走的是一条独特的现实主义路径，他坚持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⑤除此之外，功利主义者基于功利计算与最大化福祉的共识理由也是现实主义的重要方向。

无论是何种进路，都必然承认一个基本的前提，即社会成员之间能够达成对世界、事件、议题的共同理解。不过，这种共同理解在认知资本主义时代必然遭到解构。政治哲学共同的对象是围绕某些公共事务展开的，比如税收、教育、战争、科技、政策等。试想一下，如果没有一个被认为是“我们的问题”的议题，政治性也就无法产生。而围绕这些议题产生的政治争论必须具备一定的判断准则，哪怕存在分歧，也需要一个可沟通的标准框架来进行辩论，这包括理性、证据、正义、自由、平等理念在特定社会中的被接受程度，但这些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首先，政治哲学所谓的“共识”并非一种抽离掉社会性的“纯粹的客观物”，它在认知资本主义中被塑造为以市场效益为目标的“社群共识”。韩炳哲做过一个区分：“社群是共同体的一种商品形式，由消费者组成。任何的故事化形式，都无法重新点燃那团把人聚在一起相互讲述故事的篝火。篝火早已熄灭。”^⑥当今很多社群（community）试图通过“讲故事”“塑造品牌叙事”“打造情感链接”等方式来营造亲密感或归属感，但这些“故事”只是人为制造的消费叙事，无法真正唤起人与人之间那种基于共处、共患难的原初人类关系。它们不再基于亲密关系、共享经验或生活实践，而是由各自作为消费者身份的个体通过品牌、兴趣或平台链接起来。彼此倾听、诉说、理解、分享的真实空间和社会条件已经消失，深度的人类社会性链接与公共性也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因而，“存在的缺失、对存在的遗忘，是信息社会所固有的。信息只能进行叠加和累积，不承载意义”。^⑦认知资本主义与传统商品经济相比，不仅出售物品或服务，更操控神经系统与心理结构，使消费成为一种无处不在、几乎不自觉的神经过程。比如，品牌（IP）本身就是一个神经诱导结构，是可触发欲望、记忆和兴奋反应的信号。品牌通过持续讲述一个故事，如“环保”“爱”“归

① 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0页。

②③ 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5页，第5页。

④ 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3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2页。

⑥⑦ 韩炳哲：《叙事的危机》，李明瑶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第5页，第6页。



①② 韩炳哲：《叙事的危机》，第15页，第14页。

属”“自我实现”“坚守”等，来激活你大脑中已有的社会情感神经网络。一旦你接受这个故事，消费行为就不再是选择，而是一种神经上的“响应”。看似“充满意义”的故事，其实是没有真正共同体、只有商业化目标的幻觉性替代物；它不要求你走进去与其构建共同体，只要求你参与共同消费；它通过故事建构“社群”，但那不是基于人与人的相互促进的自由人的实践的共同体，而是消费者身份的短暂联结。因而，在认知资本主义中，人们生活在由资本驱动的平台算法、流量逻辑、注意力经济所“选择”与“制造”的人为现实中，我们活在一个被编码、被筛选、被投喂的现实里。用户对此种现实的体验仅仅是被信息结构决定的情绪回应，而非参与性的经验，它只是一种“拟像”（simulacra），即“在数字化进程中，信息达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状态。真实（Wirklichkeit）本身以信息和数据呈现。当真实被信息化和数据化之后，我们对真实的感受成了信息本身”。^①在这种感知结构下，人不再是“认识者”，而是信息系统中的一个被动感知器官。情绪、共鸣、愤怒、希望，都由信息自动调度。所谓的“讲故事”，不过是信息操控你的感官反应，而非生成理解与共享经验的过程。同样，“讲述和倾听互为前提”，而“倾听具有一种特别的注意力”。^②但是，这种注意力同样被深刻地嵌入资本逻辑之中，因为资本不仅提供信息来源的渠道，更规定了信息意义的边界与可见性的分配，从而在深层次上决定了人们如何感知世界、理解自身，并设定了“价值标准”的基本范式。

其次，在认知资本主义的语境中，资本在感知层面与神经系统的深层嵌入干扰了人们理解共识的认知能力。资本主义的新进展表明，资本早已不满足于对身体的控制或对时间的占用，而是深入个体的神经系统、感知结构和注意力分配机制之中，从而在最微观的层面上塑造主体性。注意力不仅是一种认知资源，更是一种被资本攫取和组织的“劳动形式”，尤其是在平台经济、社交媒体以及认知劳动泛化的背景下。这种控制并非强制性的压迫，而是通过界面设计、感官刺激、奖励机制等方式，在神经回路内部制造自动化的顺从与欲望耦合机制。也就是说，资本通过重新编码我们的感知路径、情感反应和神经反馈，实现了一种“前意识的治理”，使个体在尚未反思之前就已进入特定的消费行为、形成身份认同并参与情绪流通。资本主义的权力已经深入到语言发生之前的、尚未被理性组织的感觉层面，提前对人的经验作出调控。譬如，平台根据用户的点击和停留时间不断“喂养”其类似的内容。点过一次情绪激烈的视频，平台便连续推荐类似愤怒、悲伤、震惊的内容。日复一日，用户的价值观念、情绪就会被固化、放大，会认为“吾道不孤”，进入了被高度信息茧房包裹的“伪共识”状态。又如，日常生活中各类APP搜索中的“自动推荐”与“智能优化方案弹窗”设计，会在人尚未思考或输入完整地址之前就给出建议，很多人会顺势点击使用；优惠券弹窗颜色通常采用刺激视觉系统的红色，配合“倒计时”文字制造紧迫感。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不再“说服”你，而是直接“感觉你”、塑造你，从一开始就调控你感知世界的方式，甚至你“尚未表达的情绪”本身已被编码。这种对个体的控制，使个体在进入思考和语言表达之前，就已经被预设某种消费、顺从或分化的位置。相应地，政治恰恰关乎的是人的认知秩序的建构，“看什么”在根本上决定了社会秩序的建构机制。平台算法、信息流设计、推荐机制等技术手段重组着我们的“可见性结构”，更何况被包裹在这些“可见性结构”中的人们，已经丧失了思考所需要的停顿、距离与否定性，而这一切恰恰是认知资本主义试图消除的维度。“无时间”便意味着“无思考”，“无否定性”便意味着“无我”。平台通过点赞、转发、评论等即时反应机制，将共识简化为“点赞式认同”的幻象。在这一机制下，认同不再源于争论与判断，而是产生于一种“大家都和我一样”的错觉，这种错觉中没有真实的异议与差异。

最后,认知资本主义导致共识空间的崩溃与公共领域的退化。在德勒兹式的“控制社会”中,“人们永难了解任何事物”。^①公共领域不再是哈贝马斯式的理性交往空间,也不再是阿伦特意义上行动者通过言说彼此显现的政治场所。它在认知资本主义发展中,被重新塑造为一种流动的、无形的信息通道,在算法逻辑主导下持续地进行编码化管理。这一过程体现为,个体表达不再基于生活的共同语境与讨论规则,而是依循平台算法标注的热度、推荐机制。换言之,公共领域的话题是可以被转化、制造甚至虚化的。以“失业”为例,失业原本是一个结构性经济与政治问题,关系到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劳动关系与社会保障机制。但在主流媒体与政策话语中,失业常常被“个体责任化”,即认为失业者“不够努力”“缺乏技能”“不适应市场需求”。这种转化掩盖了系统性的问题,并将失业原因归咎于个体,从而剥夺了其公共议题的性质。而且在信息社会中,失业的现实也常被抽象为统计数据(如失业率、就业满意度等)和趋势报告(“就业结构性优化”等),公众接收到的是冷冰冰的数据和可视化图表,而非真实个体的生存困境。这种符号化的呈现使失业问题被“去痛感化”“去政治化”。在社交媒体构建的网络空间中,公共领域应当具有的否定性、批判性被转化为一种可控的“话语形式”,即使用户在其中表达愤怒或批评权力者,获得的也只是一种象征性的道德满足。这种“参与感的幻象”取代了真实的政治实践,使得否定性、批判性以及抵抗都朝向话语,遗忘了“回到事情本身”,从而被安置于体系可承受的边界内,“让你以为你已经在实践”已经成为最大的意识形态。所以,当代社交平台中的“表达姿态”已构成一种被允许甚至被鼓励的表达形式,是不同声音的“污水处理厂”。人们被邀请去谴责不公、揭露暴力、声援弱者,仿佛公共领域已经充分开放,任何声音都能被看见,但实际上,这类表达和抵抗的容许是为遮蔽权力结构的根本逻辑服务的,它们恰恰构成了维持现存秩序的手段。个体因为有了表达和抵抗而获得心理满足,更容易放弃组织性实践与制度性斗争的动力,以至于所谓的“骂”实质上正是在帮助现存结构维系自身。于是,公共领域从真正的政治行动中退化下来,沦为一种可消费、可转发、可遗忘的反抗体验。

① 吉尔·德勒兹:《在哲学与艺术之间:德勒兹访谈录》,刘汉全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44页。

微观治理术与政治的科学化:政治规范的瓦解

在认知资本主义中,政治规范的解构并非因为政治事件在表面上受到了压制,而是通过算法推荐、神经刺激、行为预测与公共领域的感官化,实现了一种“去规范的治理逻辑”。政治只剩下数据优化、情绪调节与用户参与,政治被重新编码为可计算、可追踪、可预测、可操控的“行为科学”。政治的计算化(计算政治学)成为重要趋势,对政治规范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政治在形式上依旧存在,实则已悄然去政治化。

首先,政治不再是行动的领域,而被重组为一套面向行为管理、风险控制与情绪调节的系统性技术过程。这种转变可借助“精神政治学”(psychopolitics)概念来理解。在精神政治框架中,权力不再主要通过法律、命令或暴力强制来施行,也不是福柯意义上需要通过对生命过程的管理来实现其治理目标。今天,“作为生产力的肉体再也不如在生物政治性规训社会里那么重要了。为了提高生产力,所要克服的不再是来自肉体的反抗,而是要去优化精神和脑力的运转程序。优化思想逐渐取代了规训肉体。因此,神经增强(neuro-enhancement)就从本质上与精神病学的规训技术划清了界限”。^②也就是说,在认知资本主义的语境中,这种生命政治进一步微观化、算法化,演化为对个体行为、情绪状态乃至神经反应的持续优化,进而形成“精神政治”,“它要做的

② 韩炳哲:《精神政治学》,关玉红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第34页。



①② 韩炳哲：《精神政治学》，第37页，第39页。

是让个体从自身出发，自己去影响自己，让环境威力法自发形成，同时，还会把这种法则诠释为“自由”。^①这是通过优化内在感受、感知结构和欲望机制来实现治理目标的方式。政治由此不再是围绕正义等规范展开的实践活动，而是成为一种以预测-干预-优化为目标的技术系统，依据可计算的行为轨迹和神经数据实施最优化的个体调节，从而实现政治的目的。在这一框架下，政治的科学化不仅表现为对情绪与行为的预测性，也体现为对主体感受的程序化塑造。比如，算法根据用户的注意力轨迹与历史行为推演其喜好，从而引导其“伪自主”地做出系统所期望的选择。同时，神经反馈机制用于识别个体的情绪状态，提前调整其所接触的信息密度与内容节奏，以最大程度维持其参与度与“积极性”。治理者不再对抗你的思想，而是提供一整套恰到好处的界面与环境，让你感到“这就是我自己想要的”。“这样的统治技术不仅扼守着人的工作时间，还要霸占整个人和他的注意力之所及，也就是霸占完整生命。它找到了这个完整意义上的‘人’，并且要让这个人全部为我所用。”^②治理者占有你的注意力不仅是为了诱导你，更是强化你有能力做、并且让你感觉到这么做能够确认自己“真行”。在此情境中，政治规范不再作为一个外部标准对主体发出伦理召唤，而是被内化为情绪反馈循环中的一环，服从系统推荐逻辑即可获得“心理稳定”和“社会接纳”的快感。在这种机制中，政治规范让位于注意力经济，判断能力让位于愉悦感受，抵抗冲动让位于算法匹配。因此，精神政治意味着一种更深层的对政治规范的解构，这样的技术逻辑绕过了政治规范本身，将治理直接嵌入个体的神经机制与行为自动性之中，构成了一种前伦理、前判断的“治理术”机制，政治实践的规范张力和伦理召唤被技术感知与系统反馈所消解，主体从行动者被转化为情绪调节与行为适配的对象。政治最终成为一门让人“自我适应”的心理科学。因此，政治规范在这一语境下被系统性地瓦解了。

其次，具有“责任、判断、决断”的政治主体被算法调控转化为“响应单元”(response unit)。在传统政治规范结构中，政治主体往往被设想为具备处理政治事务的能力，具有“责任、判断、决断”的品质，他们在政治事务中作出选择并需承担后果。在认知资本主义治理框架中，个体的政治参与方式不再是提出主张或承担公共责任，而是被还原为“神经-行为反馈”的关系，平台记录其每一次点击、停留、偏好，并以此持续调整其信息暴露路径、行为诱因与情绪状态。例如，通过算法精准识别用户的情绪弱点，如愤怒点、共鸣点、恐慌点，不断投喂那些能迅速引发“爽感”、激起愤怒或制造焦虑的内容，从而获得用户的注意力和停留时间。与此同时，平台将政治判断转化为一种可计算的情绪指标体系，如点赞数、转发量、热搜排名和用户互动频率，逐步取代了批判性思维与政治规范等传统的政治价值标准。由此，主体的政治选择不再基于“应该如何”，而是基于如何依靠算法和大数据找到系统推荐的最有效方案。在这一选择中，不再考虑政治规范，而是信奉算法推荐，服从于技术的优化逻辑，责任自然也转移给了算法本身。政治行动者不是在作出服从于某种政治规范的选择，而是在回应系统算法引导的操作。虽然政治在这里并未真正“消失”，而是以去政治化的形式继续存在，伪装成“参与度管理”或“风险响应”，但是，当治理优劣的标准不再是正义与共识，治理者不再是政治者时，数据效率、用户活跃度与行为可控性构成了衡量政治是否有效的标准，调节人的行为成为治理的核心目标。于是，不仅传统意义上的政治中“被治理者”遭到解构，政治中的“治理者”同样被转化为一套数据算法管理对象。政治沦为技术治理的附属系统，“可管理的反应机制”取代了“可争议的政治实践”。

最后，“政治的科学化”并非仅仅意味着政治过程受数据支持，更意味着政治本身正在被计

算逻辑重写与替代。可以说,认知资本主义完成了对政治本体——政治是什么,它如何发生,它为何具有意义——的置换,这种趋势在“计算政治学”(computational politics)的兴起中体现得尤为典型。它是“指将计算方法应用于源自线上和线下数据源的大型数据集,以开展外联、说服和动员工作,从而支持、推崇或反对某位候选人、某项政策或立法。计算政治以行为科学为基础,并通过实验方法(包括在线实验)进行改进,常用于分析人物特征(有时是总体特征,尤其在个体层面),并开发出可以个性化的说服和动员方法”。^①计算政治学声称以更高的精度、更低的成本、更强的可控性,解决了传统政治中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问题。但事实上,这一方法体系往往在技术中性的话语之下,掩盖并强化了政治行动的非政治化与治理的去主体化倾向。计算政治学坚持认为一切政治现象,包括理念、意识形态、情感和价值观等,都可以被转化为量化的数据集合,从而形成海量的数据文本以供科学分析。这已经形成了一套由复杂技术支持起来、对人类政治生活的仿真性模拟,这使得政治的未来被设想为可预测、可演化、可管理的空间,仿真变成了现实的替代品,甚至变成“现实本身”。当然,这么做的前提是将政治简化为变量与模型,将政治中出现的冲突、矛盾视为数据参数中的“异常值”,而不是在反映制度性问题。所以,政治被定义为关于系统如何最优运作的技术科学实施,是对参数进行调配的科学。此外,计算政治学将政治问题技术化之后,将治理效率作为最高价值确实得到了效果的提升,这也反过来更加强化了政治就是“信息优化问题”或“行为操控问题”这种信念,更加狭隘地将政治理解为维护系统稳定性与数据表现指标的行为,人在其中只是数据指标的“功能性的存在”。从现实来看,我们原本靠人来决定社会走向的政治空间,正被看不见的程序和模型慢慢接管,人越来越难以参与判断,反而被动地接受技术作出的选择。这意味着,认知资本主义不仅在技术上制造了“无主体的政治”,也在方法论上确立了一种剥夺政治性的计算政治学。

结语

如上所述,在认知资本主义的统治逻辑下,政治哲学正面临着根本性的理论危机:自由意志、政治共识与政治规范均遭到了挑战。但是,危机正如其词源学所示,希腊语 *krisis* (κρίσις) 并不必然带有负面含义,而是指向一种“分裂”与“判断”的临界状态。因而,政治哲学遭遇的危机并非意味着政治哲学的终结,而恰恰是它重新定义自身位置与使命的契机。在西方社会,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主导地位,认知资本主义将会不断加深,使得政治哲学走向终结成为必然的发展方向。而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政治哲学将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建构起新的学术话语体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发挥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②我们也会遭遇认知的资本化问题,不过,它不会成为社会生产方式的主导原则,因为我们一直强调:“必须认识到,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③这意味着,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需要厘清数字资本发展的边界,充分规避资本对技术创新的钳制以及技术对人的压制,始终关注造成现实生活中各种冲突、分离、矛盾的本质根源并加以克服。这决定着政治哲学的重要任务是要寻找资本的裂缝、计算的裂缝,并在不可度量之处,为新的生活、新的政治存在的方式书写属于新时代的篇章。

编辑 张 蕾

① Zeynep Tufekci, “Engineering the Public: Big Data, Surveillance and Computational Politics,” *First Monday*, vol.19, no.7, 2014.

②③ 参见 https://www.gov.cn/xinwen/2022-04/30/content_5688268.htm.